

朝鲜安全行为的地区经济影响：
对大胆转型概念的分析

(2006 年 1 月 18-19 日国际会议的项目报告初稿)

作者：尼古拉斯·埃伯斯塔特

理查德·J·艾林斯

罗依·D·坎弗森

特利维斯·坦纳

丹尼尔·B·怀特

全美亚洲研究所

二〇〇六年三月

背景介绍

这份报告是基于题为“朝鲜安全行为的地区经济影响：对大胆转型概念的分析”的课题的研究成果，主要归纳总结了该课题相关人员最终在2006年1月18日至19日在北京召开的研讨会上发言的主要内容。

此次会议由全美亚洲研究所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共同主办，在中国国际战略基金会召开。会议由世界发展研究所的丁一凡副所长和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埃伯斯塔特博士共同主持。

会议的讨论是坦率的、广泛的和富有建设性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会议召集了大批专家和学者，如此广泛地讨论朝鲜问题在中国国内可能还是第一次。

出席会议的有来自五个国家的学者（美国、韩国、日本、俄罗斯和中国）及两个国际组织的官员（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仅中国学者就来自十个不同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有些是中国重要的智库机构。

会议的结果超出了主办者的预期，因为此次讨论朝鲜安全行为的外部经济影响的会议恰恰与另一个重要事件相同时发生，这就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对中国的访问。虽然这是一次“非正式”访问，但是却充满了象征意义和一定的含义。金正日的访问据说带了三百多名随从，并且重访了当年邓小平1992年著名的“南巡之路”中国领导人至今仍

称它推动了中国改革的停滞期)。在访问的最后，金正日还在北京受到了中共中央全部九位常委委员的接见。¹

外界可能对中朝领导人会见的细节和内容知之甚少，但是这次访问和我们这次会议在时间上的不期而遇给我们的讨论带来了丰富的内容。

为什么开这样的会？为什么选这个主题？

为什么我们要研究朝鲜的军事政策和国际安全行为的经济影响？至少有五个理由。

首先，显然还没有人从事过这方面的研究。

尽管这听起来有点让人吃惊，但是事实是至今为止国际上还没有一个研究机构从事过这一课题的研究。仅从文献资料积累上就可以证明这点。例如：《经济文献》电子数据库显示，从1969年以来的经济文献显示只有屈指可数的几篇文章间接地涉及了这方面的内容。²同样，在《PAIS》电子数据库中，存有自1972年至今的公共政策及外交政策相关文献，其中有几百份涉及国际安全与防御政策或是朝鲜，其中有一小部分涉及朝鲜的安全行为可能带来的经济影响，如：韩国的军备竞赛、被迫干预朝鲜核态势的经济手段的影响，但是从没

¹ 中国和朝鲜关于金正日2006年1月“非正式”访华的报道见新华社2006年1月18日《新华社报道中朝领导人会见》，BBC全球追踪2006年1月18日报道，朝鲜中央广播电台2006年1月18日《朝鲜语辞播报道金正日访华》，及BBC全球追踪2006年1月19日报道。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中央常委会全体成员轮流接见一位外国首脑是一种特殊的待遇，通常只用于来自于兄弟般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这种接见显示了相关的国际讨论、协议或是待决定的问题在中国领导人内部达成了高度一致。

² 自1969年以来，《经济文献》显示，只有几份资料涉及了韩国间的军备竞赛，还有几份涉及了韩国统一的经济影响（在这些材料中朝鲜的军事转变是作为假设前提的）。但是事实上没有讨论过朝鲜的军事政策和国际安全行为对其本身和周边国家的影响。

有系统地分析过朝鲜的安全行为可能带来的经济影响，或是补偿这种安全行为所隐藏的经济机遇。³

其次，是因为平壤的外部行为导致的经济影响可能具有重要的作用——不仅仅对朝鲜的经济表现，也会对其相邻的经济体产生影响。

对朝鲜本身而言，由于政府将主要资源集中在国防上，并且长期保持军事优先，显见其经济发展和福利相对于国家安全是处于次要地位的。

然而，作为朝鲜的邻国——中国、韩国、日本、俄罗斯、甚至美国，是否会从经济上受到朝鲜这种安全行为的影响，尚不明确。如果要列举平壤当前外部态势的特点，不外乎以下几点：

- 核武器发展
- 潜在的核扩散
- 弹道导弹项目
- 与韩国仍处在战时状态
- 诱拐海外人士
- 外交极端好战
- 以国家行为参与毒品交易和伪造等

因此认为朝鲜邻国的人会因其行为而产生一些经济成本，这与通常认为的朝鲜安全行为会对国际经济带来一定好处和机会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

³ 尽管有一些《PAIS》上同时涉及“朝鲜或是 DPRK”、“经济的”、“安全、军事或国防”三个内容的参考文献中有几十份，但其中大多数仅仅是该地区安全形势的归纳。有几篇涉足了朝鲜的军事或安全行为与经济间的关系，但它们全部都侧重于分析可以迫使平壤在一些特别问题上（如核武器发展问题上）改变态度的强制经济外交的可能性。

第三，这个题目非常值得研究。也就是说，这个问题中的许多方面通过一定的经济调查是值得推敲的，再进行“严格的经济推理”⁴，并在政治经济的框架中进行分析。

该研究的程序是将重点放在北朝鲜安全行为对地区的经济影响，可以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问题：

- 朝鲜军事转变的经济成本及收益
- 一个突然的朝鲜“安全突变”对地区贸易和投资的影响
- 风险、交易成本及东北亚地区国际经济：向新的朝鲜安全机制转变带来的影响

- 终结敌对状态导致的对韩国宏观经济上的和分配效应上的影响

- 朝鲜安全行为导致的中国东北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贫困减少

- 一个威胁减少的朝鲜半岛安全环境给国际社会发展带来的机遇

- 朝日关系正常化：前提及可预计的金融条件

- 朝美经济关系：解决安全这一突出问题后的贸易效果

上述问题及相关问题，大致包括了具有可行性研究的范围，从而可以得出符合相应标准的可公布的研究成果。

第四，因为对朝鲜的安全难题进行经济学分析可能可以带来一些解决这一棘手问题的新想法。

这种新想法并不仅限于对已然存在的两难问题进行建设性的研究，运用经济推理的办法对朝鲜的安全行为进行深入研究，则可能得到一些新的结论。简言之，从安全的角度分析问题，通常是零和游戏，

⁴ Cf·马休斯·诺兰德等，《严格的思索：朝鲜经济的崩溃和复杂》，《国际经济研究所工作报告》No. 99-1（1999）。

而从现代经济学角度出发，运用“最优选择”则可以从资源合理分配的角度侧重分析，从而达到双赢的目的。这种考虑问题的方法特别可以用来重新分析已经处于死角的问题。

第五，这个题目具有政策适用性。

更好地理解朝鲜的军事政策及其安全态势，及其对周边国家产生的经济成本，对各周边国家政府而言都是有用的。同样，正确估计朝鲜的外部行为改变带来的经济机会对周边各国政府也是十分有用的，这种研究可以提供原本无法得到的信息，从而在同样条件下使与朝鲜互动的各国政府可以更加协调。而且，只要国际社会与平壤在一系列安全问题上处于僵局，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时间表就显得无法预计，进行这个问题的研究则可以作为一种“政策预案”，一旦机会出现，由于有了先期研究，各国则可以按已经制定的战略迅速做出反应。

同时我们还要强调，虽然这项研究可以使不得不与朝鲜打交道的各国政府的决策者们获得更多更高质量的信息，但并不说明有关各国需要在立场上统一协调，各国还是应该按照各自的利益需求制定政策，无需考虑邻国的利益。从这方面来说，这项研究则更加侧重于朝鲜各邻国在面对朝鲜外部政策时具有共性和利益交叉的区域经济影响，从而对各国的朝鲜政策进行协调。

上述五点说明，这项研究不仅需要一次会议，更说明需要一次与朝鲜问题关系密切的五国（中国、韩国、美国、日本和俄罗斯）学者共同参与的会议。由于确信我们的研究是有决策参考价值的，因此也

希望相关国家能了解我们会议的讨论结果。⁵

为了使相关的讨论更加集中和有效，我们采取了启发式的方法，即假设了一个“大胆转变”的概念，(这个概念也是受到平壤要求美国政府实现朝美关系根本转变这一要求的启发)。“大胆转型概念”是假设朝鲜在实现下列条件后朝鲜未来的“一种可能”

- 1) 朝鲜政府保有在北朝鲜的主权；
- 2) 朝鲜保持社会主义制度 (计划经济)；
- 3) 朝鲜满足周边邻国的安全关注；并且
- 4) 朝鲜从“军事优先”向“充分防御”成功转变。

从历史的推理看，朝鲜的这种转型好比铁托时代的南斯拉夫，成为一种具有一定“普通斯大林主义”⁶属性的政治体制，但是不具有修正主义的针对邻国的威胁或敌对行为。

鉴于目前的情况和朝鲜现状，一些读者可能马上会认为“大胆转型”在朝鲜的安全行为中是不现实。(参加会议的学者们不止一人对此仍有保留意见)。我们并不把这样的转变必然看成是金正日的转变。“大胆转变”仅仅是一个概念上的选择，用来帮助分析朝鲜的外部安全行为对其邻国的经济影响(用来对照朝鲜半岛上存在一个斯大林式的国家、一个朝鲜式的政府、或朝鲜式的经济政策)。这种假设式的未来朝鲜是为了帮助会上的讨论：提供一种基值，从而朝鲜的各种外部

⁵ 读者们可能注意到了朝鲜既没有参与我们的研究也没有出席最后的会议，首先因为出席会议的五方希望能进行充分的讨论，担心朝鲜的参加会引起激烈的争论。再者这种担心并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因为会议的美方没有找到合适的北朝鲜代表参加会议，他们希望找到一个能用现代西方经济学方法参与研究和对话的代表。

⁶ 参阅罗纳德·提尔斯基，《普通斯大林主义：“民主的中央集权”及共产主义政治发展问题》，波士顿：乔治艾兰和安文出版社，1985年。

安全态势可以进行横向比较。

利用“大胆转型”假设不仅从方法上可以让讨论进行得更加集中，同时也可以防止我们的讨论跑题。因为无论事先设立什么样的题目，只要研究朝鲜部问题的专家们聚集在一起，经常会出现一种跑题现象：即出现一种克里姆林宫化，专家们根据近期的某些神秘变化，无休止地陷入了对“朝鲜问题”解决方案的各种猜测和想象的讨论。而有了“大胆转变”这一概念作为会议的核心议题从很大程度上避免了那种没有太多实际意义的跑题，主要原因是“大胆转型”这一假设已经假设朝鲜已经做出了一个全新的和根本的变化，这与当前关与朝鲜的报道已经相去甚远了。

分段记录会议：地点和与会者

我们计划在北京举办这次会议决不是偶然的，更应该说，中国专家的参与对此次会议的题目十分重要，从地理和官僚政治两方面看，在北京举办这次会议比在其它地方举办更容易得到中国专家的意见。

可以想象，为了实现在中国举办这次会议，并请一定水平的、高素质的中国专家参与，我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与中国各方面的学者接触，以使他们与我们一样，能与会的各国学者充分地、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

我们此前两次专赴北京，与各研究机构的专家讨论，从而判断“大胆转型”对北京而言是不是一个值得专门开会讨论的内容。

2006年1月18日至19日会议主要观点

会议分九节进行，每节有一位专家提交论文，除第一节外均有一

位或多位指定的评论人。

会议的氛围：谈话的社会学⁷

如果不对两天会议的气氛、相互影响的要意和与会者的立场作一定的描述，仅有的会议记录不足以反映会议的真实成果。下面就是对会议的一些综合描述及按参会者国别的立场所作的简要记录。

总的来说，会议的讨论是公开的、积极的甚至可以说是热烈的。尽管有时争论得很激烈，但是相互间的尊重和幽默同时存在，几乎每节都出现了一些小玩笑和笑声，大家都避免涉及一些敏感问题，总的气氛相当轻松，两天内只有极少数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些“争论”或是针对其他与会者“占上风”的情况。

虽然“大胆转变”概念与当前的现实相去甚远，与会者都能将自己对这一概念的质疑暂时搁置，并积极加入这种“思想上的试验”，从而探讨朝鲜这种安全行为变化可能带来的区域影响，尽管大多数与会者并不相信现在的朝鲜政权会做出这种改变。这种讨论是富有启发性的，抓住了每一位与会者，每节讨论都超过了预期的时间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这点，虽然主持人努力执行会议程序，但几乎每一节都有参会者未能如愿发表自己的意见。

现在简要介绍一下各国与会者的贡献：美国的与会者如预期的一样表现出了真正的美国牙形，坦率、愉快、对自己的学识充满自信、乐见不同意见、经常会有点紧张，甚至有时对自己的无意中的疏忽过于固执，美国与会者带来了当代学术和学者聚会常见的气氛。

⁷ 我们并没有故意忽略唯一一位从俄罗斯来的代表的意见——仅因为从统计学角度来看一个随机的数据不具有代表性。

中国的与会者从另一方面带来了广泛的意见，因为他们被分在各个不同的部分从而提供了多种不同的意见。

日本学者通常在谈论他们国家的朝鲜政策和他们政府对平壤外部行为的关注时十分谨慎，特别是在中国和韩国听众面前，这种谨慎有时表达出来的意见近乎含糊其辞。可是在我们的会议上，日本方面解释东京对平壤的政策时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模糊表述和防御性的口气。特别在迫于一位韩国与会者要求明确日本在与朝鲜关系正常化方面的立场时，一位与会的日本政府观察员明确地、非道歉式的回答顿时使会场安静了下来。尽管这在别国可以被看成是外交上正常的有来有往，但是实际上战后日本的外交礼节中几乎没有这种往来，仅仅是最近情况才有所变化。显然，这样的交锋对其它亚洲参与者还是十分新鲜的。

从近期的记录看，韩国专家和研究人员在类似的国际会议上通常会对朝鲜的政策和做法提出尖锐的批评。然而时间和情况都已发生变化。今天，韩国专家在讨论朝鲜的外部态势时常常是最能容忍和理解朝鲜的。这种转变有一代人的特征，同时也与首尔对朝鲜官方政策的变化相符（自九十年代以来南北朝鲜间的和解一直在被坚定地推动中）。

有了各方的积极参与，释放了能量，及与会者不期然的角色扮演，带来了讨论的流畅进行，从而打破了从形式上到观点上的保留和拘谨，这也就是国际性交流可以解决争端。所有这些都值得一述，因为这可以使读者更好地感受此次会议的主要内容。

两天讨论涉及的主要议题

从记录看，一系列相关的议题值得记录，我们将他们归纳为以下十点。

1) 朝鲜安全行为的经济成本及潜在的较修正主义的和较少威胁的朝鲜国际姿态所带来的机会成本是大多数目前暴露在平壤外部实践的危险中的有关政府没有考虑到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与会的各方在参加会议之前同意讨论这个事先设定的题目等于表示了一种多国的或是多边的共识。

当然，并非与会者在现存的成本和看不见的潜在利益的国际分配的具体数目上能达成一致意见，但是多数认为是朝鲜的邻国都因为朝鲜的首先举动承担了一定的财政负担，也都认为朝鲜安全环境的变化可以为其所有邻国带来经济上的好处。这使得讨论可以顺利进行，尽管有时与会者会偶尔跑题去讨论相关和政策细节，尽管我们的假想命题有一定的天生缺陷。

我们的会议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首度估算当前政策的具体成本，及从可能的根本性变化中尚未获得的机会。同时也达成一定的共识，即应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的调查，有能力的研究人员应建议相关决策圈子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

2) 平壤的军事政策和安全行为如能采取这样的“大胆转变”无疑会给其周边国家带来经济上的机会和好处，但是很难想象当前的朝鲜政府会接受这样的路线。

与会者几乎都认为，从中立的角度看，无法想象现有的金正日政

权会接受这样的政策路线。

不太相信朝鲜的东北亚邻国可以从它的“大胆转变”中获得好处的重要理由就是平壤官方明确宣布的“军事优先”这一细节。事实上，可以说从经济上讲，朝鲜是东北亚地区的输出者，只不过它是通过强大的常规武器力量、通过尝试建立核武库、通过与国际社会对立来主要出口经济风险。如果在东北亚地域的中心能够减少敌对、增加合作，环境上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将会有效下降，交易成本则会相应减少。除了这种静态的结果，还可以看到动态的结果，比如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交通、通信、能源管线的发展）可以带来商务成本下降并刺激区域经济发展。换言之，只要朝鲜仅仅停止向这一地区制造和输出紧张和不安就可以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从而产生所有经济一体化可以带来的好处。

对现在的朝鲜而言，这简直是一个太大的“如果”。绝大多数与会者表达了对金正日政府会接受这样一个安全行为大掉头的怀疑。会议始终充斥着对这种可能性的悲观的预计。有一位与会者客观冷静地分析了当前困扰着朝鲜制度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危机的相互制约。尽管这一体制有点功能紊乱，这位发言者称，平壤对国际社会的挑衅性行为有其自身的逻辑，其当代领导人认为这是他们的政权得以维系的关键。由于认为经济改革可能带来其国内不可控制的变化，也没有国际社会能够提供的维持现政权的保证，金正日政权事实上可能认为目前的国际军事姿态是危险最小的一种选择。

虽然大多数与会者表达了他们对今日朝鲜可能采取“大胆转型”

的怀疑 ,但是两天的讨论中与会者在表达这一怀疑时的不同态度是十分重要的。部分与会者直接可间接地表示朝鲜无法承受这种“大胆转型”所带来的一系列后果 ,换言之 ,这样的重新拟定政策将导致他们的“有朝鲜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根本上被动摇。其他人虽不质疑“大胆转变”这一概念本身的价值 ,但是不可想象金正日会采取这样的路线。因此又产生了一个新问题 ,即朝鲜的后金正日领导集体是否会认为“大胆转型”是可行的。

3) 一个“大胆转型”很可能带来朝鲜经济的显著改善 ,即使平壤仍保留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经济并不进行实质性的经济改革。

一份会议论文认为 ,朝鲜的欠佳的经济表现不仅是因为其苏联式经济天生的低效率 ,而更多是平壤特殊的高度军事化的结构造成的。文章还称 ,国际发展模式证明 ,如果朝鲜采用“正常的斯大林经济” ,那么它的人均出口和人均收入都会比现在高得多。在认可从“军事优先经济”转向“正常的”苏联改革前的经济模式的可行性的前提下 ,这位作者建议 ,在朝鲜的改革意愿被确认为可靠时 ,国际社会承担一定的这种安全改革所需的改革成本。

虽然部分与会者对该论文的计量经济方法提出了一些技术性问题外 ,与会者基本上同意该论文的大胆设想和有关结论。同时 ,文章提出的关于朝鲜未来的经济模式的“假设的一种可能”是附合朝鲜在决策过程中经常使用的计算成本与收益这一特别而又麻烦的方法的。虽然从“军事优先政策”到“足量防御政策”这一转变能够毫无疑问地给朝鲜的出口和进口带来增长 ,并提高朝鲜人民的生活水平 ,但这并不

足以说服现在的朝鲜领导人采取新的安全政策。

4) 一个“大胆转变”对朝鲜而言可能还不够大胆。

这个观点是数位西方与会者在发言中都不约而同地提到的(也得到了几位中国代表的明确支持)。虽然个人的表述形式不同,但共同的观点是无论是朝鲜还是东北亚邻国都可以从这样的大胆转变及其后可能的经济改革中得到远大于以上所说的这些好处。简言之,“大胆转变”后的开放应伴随着相应的经济开放,从而为基础设施建设注入资本,铁路网和能源管线可贯穿新的和平的朝鲜,否则,如果没有商业友善的氛围就仍有可能出局。另一些观点认为经济僵化会对朝鲜的经济十分不利,即认为“大胆转型”可能只能提供一次性的生产力水平上升,如果没有后续的政策支持。

讨论的另一方面显示,主要是与会的中国代表认为,朝鲜有可能首先开始经济改革而不事先调整其国际安全政策。这是一个有意思的同时也非常让人好奇的判断。鉴于他们自己国家近年来的历史经验,中国与会者知道这与七十年代中国成功地先改善国际安全环境再进行经济改革的顺序是完全不同的。如何在国际安全问题未得到解决的环境下进行经济改革(并吸引国际资本)在现在看来还无法解释。

5) 朝鲜目前的与国际社会对立的态势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经济改革和贫穷减少产生直接的不利影响。

一位经济学家谈到,平壤的安全行为对中国东北的经济繁荣尤为不利。他认为,中国东北的经济表现和经济改革都稍显逊色,这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由于这一地区因地缘原因受益于区域经济和世界经济

一体化的机会相对有限。对于中国东北而言，进一步加大经济一体化的最主要障碍是邻国朝鲜这一“黑洞”，许多不安全因素使其与外部世界的正常商务往来显得更加困难和昂贵。

有趣的是，部分韩国与会者对上述分析有不同意见。部分韩国代表认为，韩国现在对朝鲜的投资和贸易并没有受到朝鲜目前的安全态势的影响，甚至认为韩国对朝鲜和中国的投资和贸易在两国间是有“互补效应”的。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部分中国与会者认为这一观点与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是不符的。

6) 朝鲜安全行为的重大改变是可以给其东北亚邻国带来深远的经济影响，但是这种影响的强度和范围现在还无法确定。

这是一位美国机构的经济学家提出的观点。这篇论文认为，韩国、日本和中国在朝鲜不利的安全行为加深后可能引发的“传染效应”面前都是脆弱的，这种行为包括一次核试爆或是与平壤有关的核原料落入恐怖组织手中。

该作者认为韩国、日本和中国都很容易受到“商务恐慌”的影响如果朝鲜采取了边缘政策或是进攻态势。同时他还强调，如果平壤的行为导致了更加广泛的国际制裁而中国又坚持与朝鲜结盟，那么中国受到的损失就更大。

作者还警告说假设的由朝鲜引起的“经济打击”对韩国、日本和中国的贸易、投资、产出和就业的影响需要进一步精确的估算和深入的研究，但参考在其它国际热点地区的“安全打击”，仅仅一个关于朝鲜的小恐慌也足以对其东北亚邻国经济产生暂时的、可以控制的破坏。

该论文还鼓励进行后续研究，特别是对其描述的潜在经济影响进行量化分析。但他同时还触及了一个与当前政策有关的问题：如果朝鲜的邻国可以与已核试的朝鲜共存，仅从经济的角度看，也并不意味着朝鲜最终解决核问题对该地区经济是没有意义的。

7) 朝鲜“大胆转型”后的经济重建将主要是一种财政保证，但这在成为成本的同时也会带来相应的经济回报，这种回报的程度和分配方式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后序的政治和政策安排。

非常感谢提出这一观点的作者是通过跨太平洋电话的方式向与会的其他代表介绍他的观点的，他认为相对于其它朝鲜可以选择的方案，德国统一模式对南北朝鲜特别是北朝鲜经济重建是一种可行的选择。

该文指出，对于朝鲜经济重建所需资金这一具体数字而言，近来发表的各种论文所提到的数字差别极大，小到几百万美元，大至几十亿美元。作者认为，这些论文的研究有些不够精确，有些研究问题的假设前提很难成立。作者特别提出，以南北朝鲜的人均收入水平为例，两者是应该逐步拉平，但是对于朝鲜经济重建的初期朝鲜人均收入能够翻一番就已经是了不起的进步了。至于如何实现人均收入翻一番，他认为，则取决于一系列因素，包括制度和政策气候、军事转变的步伐及实现翻番所需的时间。但他认为朝鲜重建所必需的投资额远低于目前通常认为的数量，如果这些资金同时来源于朝鲜半岛内部及其东北亚邻国的私营和公共部门，则可以看成是一种全面的可控制的接管。（为此他提供了相关的测算方法）。作者强调，朝鲜的重建好比是

一项投资，这种投资是有预期回报的，而且持续的重建工作必然可以给所有的投资方带来回报。

上述观点在会议上并没有达成共识，部分与会者好像被作者说服了，还有一些对他的方法和结论持有怀疑。现在看来，希望当时达成共识是不合理的，因为理解这一结论需要经过一系列无法回避的投机问题，而目前缺乏当前朝鲜经济状况的基本数据，外部观察者也无法得到可以用来分析朝鲜经济运行情况的相关参考数字，仅从外部估算重建所需的力量只好扩大范围，因此就可能出现很大的错误。

8)虽然国际金融机构最终被证明可以提供朝鲜重建所需的资金，只要朝鲜能够解决国际社会对其安全行为的关注，但是朝鲜要与国际金融机构的所有相关成员达成协议的机会相当小，除非平壤同时作好了放弃它的很多非军事政策和作法的准备。

一位曾就职于世界银行的与会者在他的论文中列举了朝鲜如果想加入世界银行或其它国际金融机构所需要达到的要求。至今为止，朝鲜政府仅对能立刻见效的、有重大意义的并能自由向朝鲜输入资源的国际政治协议有兴趣（如双边援助协议、金刚山旅游项目，及1999年美国对其所怀疑的基地进行核查缴纳的核查费用等项目）。相反如果要加入国际金融机构，则会给朝鲜带来从他们看来很多新的负担，而马上能见到的回报则很少。财务状况的披露——这并不是朝鲜的强项——会马上增加外部机构接触朝鲜官僚的机会，给外部提供了“增强能力”的机会，而外部机构会用朝鲜决策者们所不熟悉的一套方法来衡量朝鲜的状况，诸如法律体系的质量、政策和计划对环境的影响、

减少贫困的影响等等。成为国际金融机构的成员后，这些机构的贷款并不会马上投入使用，而需要事先进行周密的准备，准备的过程也需要朝鲜有关方面的全面配合，贷款监督机制也会按部就班地到来，以保证款项只能用于合同中指明的用途。

虽然作者并不需要说得这么明确，但他的论文说明了在成为国际金融机构合格的借款国之前平壤还需要在标准和操作方诸多重要改变。即便如此国际金融机构所能带来的资金也不一定就是大量的。作者按目前的条件估算，朝鲜只符合世界银行 IDA-14 的借贷标准（世界银行可以做出的最大让步），这仅意味着每年 2500 万美元至 2.5 亿美元的贷款额。当然还可以有来自其它国际金融机构的贷款，但也仅限于这种“特别信用基金”（资金只能用于已指明的双方同意的特别目的）。

该论文受到了广泛赞同，引起了积极的讨论，部分代表认为作者可能为朝鲜未来从国际金融机构得到资金支持描绘了一幅悲观的画面。部分与会者怀疑其它国际金融机构的贷款手续是否也是同样繁重（例如亚洲开发银行），也有人质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是否真的严格要求其成员国必须公开财务状况。同时鉴于目前朝鲜能够从国际金融机构获得的贷款十分有限，部分代表建议国际金融机构可以利用其本身信誉担保，利用其它国际私营或公共部门的资源，向朝鲜提供援助，这类似于一种技术支持。

9) 朝鲜坚持在与日本关系正常化的同时获得一定的资金支持，即便这一目标可以实现，仍会存在一系列不确定因素。平壤最终能够

与东京达成何种框架协议尚不明确，伴随该协议日本所能提供的资金规模也不明了。

国外观察朝鲜的人士都知道日朝关系正常化给朝鲜带来的经济意义是巨大的，但并不会仅因为这种经济利益而要求这种正常化。而了解日本方面对东京-平壤关系正常化内部情况的人也十分有限，因为日本政府内部也仅有很少数人愿意谈论这笔费用的可能数目。

一位日本与会者简要地介绍了日本官方的想法，他个人的认为日本政府目前并不急于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除非绑架问题、核问题和导弹问题都已有了圆满结局。他还表示，如果日本与朝鲜关系正常化的经济援助达到 1965 年日本与韩国关系正常化时的规模是合理的。

1965 年首尔与东京关系正常化时曾是一个以日元为主的十年期援助计划总值约 8 亿美元，大体包括捐赠、软贷款及用于日本向韩国采购用的出口信贷。

按这种猜测估算，用目前的条件对照当时的一揽子计划，人口规模不同，价格水平不同，也许还有现金折扣，再加上一些当今的标准化判断，这也许就是将来日本对朝鲜关系正常化可能带来的一揽子经济援助的雏形。

结论性评价意见

尽管这次会议提出了一系列重要问题，而且专家们也没能达成一致意见，但与会者都认为这是一次开拓性的会议，关于这一课题今后有很多工作可以做，无论是按一个国家的专家来做或是多国专家合

作。这是首次用经济视角来看朝鲜的安全行为，用一句老话“只触及了皮毛”来形容是最恰当不过了。

从政策研究层面看，各方“带回家”的一个新观点是，与朝鲜军事政策和外部态势相关各国由于朝鲜行为造成的成本并不仅限于对外援助本身。这种成本，对朝鲜所有邻国来说，都应该包括因此而失去的发展机会，及由此产生的代价，特别是朝鲜的盟国中国。另一奇怪的巧合是，一个美国财政部的代表团在我们会议开始之前正好到中国访问，向中国政府通报所谓朝鲜伪造美国货币的问题。不难看出，中国银行在朝鲜的这种违法行为面前间接受影响的问题肯定是谈话双方最关注的问题。对于一个政府而言，肯定不愿意面对由一个正式的盟国的安全行为而带来的一大堆问题，也很难看出最高层决策者们如何将这些问题一一解决。

按照传统的非最佳政治经济或公共选择的学术框架，可以看到的紧张通常出现在失去了经济机会的潜在受益者与受益于当前这种低效状态的直接利益相关者之间，这次会议的最主要结论是，没有一个朝鲜的邻国在朝鲜安全行为关注的两难问题解决前是受益的，相反，所有这些国家都因为这种安全行为而付出了直接代价或是失去了发展的机会，虽然各自程度有所不同，因此它们必会因朝鲜安全行改变而得到经济上的好处。

目前的朝鲜政府是否愿意或是有能力将其邻国的经济利益考虑在内是我们这次会议无法全面解释的问题，但是我们的会议再次强调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而且不仅仅针对研究人员。